

◎ 美在生活

在饮品繁多的今天，茶，依然在中国享有特殊地位。中国是茶的起源地之一，是世界上制茶、饮茶历史最悠久的地区，也是将茶事深深嵌入自己文化传承的国家之一。

茶之源

古代的典籍中最早出现茶的文字记载是《诗经》。《邶风·谷风》中有：“谁谓荼苦，其甘如荠”之句。这句中的“荼”到底是茶，还是指苦味的野菜现在还有争论，但这先苦后甘的味道，确是茶味之原。《尔雅·释木第十四》中有“檟，苦茶。”东晋著名博物学家郭璞注此书时写道：“树似栀子，冬生叶，可炙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茶，晚取者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茶。”学者们虽然对于檟、茗、荈具体是指哪种类型的茶有不同的见解，但基本认为这里的“茶”即是“茶”。西汉中期，著名的辞赋家王褒写了一篇充满诙谐趣味的《僮约》赋，在这篇赋里，他给家里的僮仆立下了职责范围，当中就有“烹茶尽具”（煮茶及清洗茶具），“武阳买茶”（到武阳买茶）两种工作。可以看到，在西汉，茶叶已经成为士人生活中的一种饮品，当时的饮用方法主要是用煮羹汤的方法，而且茶已成为一种专门的商品，可供买卖。成书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可见，古时中国人将茶视为具有神奇解毒功能的食品。中国的第一部关于茶的专著唐代陆羽的《茶经》即说：“其字或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其名一曰茶，二曰茗，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就一股脑儿把这些字都统到“茶”底下了。

如果说唐代以前中国人喝茶的历史还是比较模糊的，到了唐代因着陆羽所撰写的《茶经》，中国人的饮茶进入了有完整的理论与体例的时代。陆羽是个孤儿，自幼生长在寺院之中，长大成人之后，他谢绝了入朝为宦的邀请，行遍半个中国，采茶制茶，品茶觅水，隐居苕溪（今浙江湖州）完成了7000余字的《茶经》。这部书第一次全面记载、论述了茶的起源、产地、效用、生产过程、饮茶器具、饮茶风俗等与茶相关的问题，是茶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标志与总结，亦为中国茶文化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故宋人梅尧臣有言：“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春茶。”

茶之味

唐代人喝茶法已不似汉代直接摘下煮了。为了能让茶叶保持更久时间，并去除其中青涩的草味，人们将茶采下后，放到甑釜里蒸一下，然后将蒸过的茶捣碎，再把茶末放到铁范里压实，制成团饼，然后烘焙、封



陆羽《茶经》

◎ 家风家训

# 郑观应：有一艺之长方自立

胡忆红

在澳门有一处岭南风格的四合院大宅——郑家大屋，这是近代中国思想家郑观应的祖屋，在21世纪初作为澳门历史城区的一部分被列入世界物质文化遗产。在郑家大屋正厅有一副对联：“惜食惜衣不独惜财还惜福，求名求利必须求己免求人”，时刻警醒着郑氏族人具有“必须求己免求人”的自立精神。

如何自立呢？按郑观应的话说，世间上知识的门类太多，不可能博览兼收，“善耕者不必善织，能读者不必能商。但求一艺之精，可为世用，足矣。”1914年，时年73岁的郑观应自感

身体不佳，预立遗嘱，将房产、钱财分配给妻子女之后，特别叮嘱子女们：“我知二十世纪觅食艰难，故定家规，甚望我子孙各精一艺，凡子孙读书毕业后及二十岁后，不愿入专门学校读书者，应令自谋生路，父母不再资助。”这一家训与以往轻视技艺的传统观念大不相同，很有现代气息。

郑观应是广东香山县人。香山离广州不远，又与香港隔水相望在近代西风东渐中领风气之先，商业氛围浓厚。所以，郑观应早年是循着“才不足于儒，则反而归贾”的路子前行



台北故宫藏钱选作品《卢仝煮茶图》局部（元）

皆有佛性，欲成佛就须发现自己心中的佛性，而要发现佛性，就必须在思想上开悟。开悟有诸多方法与途径，坐禅渐修只是其中一种，更重要的是见性成佛，顿然开悟。如何让弟子们能明心见性，变成修禅的关键所在，所以，唐宋两代禅宗祖师借助了许多日常生活中的事项来启迪子弟。饮茶之道，一直被认为是提神精进的上品，又有繁琐而严格的工序，自然在唐宋时期大当其道。

茶独特的清香与回味，成为禅味的绝佳注脚，受了禅宗文化影响的士人们，在这过程中也将富有禅意的审美方式倾入对茶的品味之中，成为中国茶文化的“大传统”。在陆羽的眼中，这种审美也延伸到茶具。例如他认为茶碗用越州的青瓷比邢州的白瓷要好，首先越瓷如色泽如玉，而邢瓷如银太过耀眼；其次越瓷如冰晶莹剔透，而邢瓷如雪没有通透之感；再次陆羽认为上好的茶汤呈淡黄色，用越瓷装盛能显得茶汤青翠，而用邢瓷装盛则显得茶汤偏红，流于俗气。从法门寺出土的唐代宫廷所使用的纯金茶具，到宋代的兔毫盏再到明清盛行的紫砂壶，人们对各种茶具的追求也可看出中国文化在饮茶中的传承。至于茶味，唐人卢仝的说法最妙，“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将喝茶的种种好处诸如解渴、破闷、增进灵感、快意、了祛凡尘描写得淋漓尽致。尤其是“两腋习习清风生”顿时将饮茶之后超尘脱俗之感点晴道出。苏东坡也有诗云：“仙山灵雨行云湿，洗遍香肌粉未匀。明日来投玉川子，清风吹破武陵春。要知玉雪心肠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戏作小诗君莫笑，从来佳茗似佳人。”将佳茗比作佳人，成为茶诗中一绝作。

茶之道

中国的饮茶之道，一方面由于制茶工艺的进一步发展，由唐宋时期以团茶为主的饮用方法，变成了以散茶为主，在茶叶制作上，由原来的蒸青改为炒青，即将新鲜的茶叶摘下后，采用焙炒的方式脱水留香。这种技术上的转变经历了宋、元、明三代，前后约三四百年的漫长历程；另一方面受宋明理学，尤其是王阳明心学的影响，在其发展上进一步跟“百姓日用”结合在一起，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常见饮品，更成为一些士人的生活方式。

有论者认为唐宋之后茶道在中国衰落，反倒在日本流传下去，其实不然。日常饮用的茶叶从团茶变成散茶后，饮茶程序简化许多，但人们对茶叶的产地、鲜度、煮茶用水、茶器的追求更加精益求精，士人在品茶时更追求“茶有真香”，品鉴茶的本味。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在其《茶谱》序言中更是直言饮茶：“本是林下一家生活，傲物玩世之事，岂白丁可共语哉？”明遗民杜濬，一生清贫，唯嗜茶如命，将饮过的茶叶渣存留下来，每年为其筑坟，还特地写过一篇《茶丘铭》来阐述自己与茶的关系：“吾之于茶也，性命之交也。性也有命，命也

有性也……吾好茶不改其度……有绝粮无绝茶也。”将饮茶视为自己生命中至为重要的活动。在《红楼梦》中还可以看到妙玉对饮茶的“执着追求”，被她认为“俗人”的人喝过的茶具要扔掉，喝多过三杯，便是“牛饮”，招待重要的客人，自要用花费许多时间精力收集的雪水来煮茶，更遑论要拿上品好茶来了。

饮茶风气在文人雅士之中广为盛行，在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普通百姓饮茶虽不能如文人雅士般追求精致，但从最初的功能来说，茶可清毒解渴，却是日常生活必需之物。因此，民间一直流行煮茶，后来将其他食物与茶同煮，以消除茶的生涩之味。明代的《金瓶梅》第七十二回，写到潘金莲给西门庆泡了一杯茶，“从新用纤手抹盏边水渍，点了一盏浓浓艳艳，芝麻、盐笋、栗丝、瓜仁、核桃仁夹春不老海青拿天鹅，木樨玫瑰琥珀，六安雀舌芽茶，西门庆刚呷了一口，美味香甜，满心欢喜。”这盏茶中除了六安雀舌芽是正儿八经的茶叶之外，竟然加了10种其他辅料。现在蒙古的奶茶、西藏的酥油茶、客家的擂茶均是这种饮茶方式的留存。民间喝茶更直接省便的方式即是拿大杯或大壶泡了。由清至民国，茶馆遍及全国，茶馆里给普通百姓喝茶即是拿大壶冲泡的，去茶馆喝茶方便实惠，既解了渴，也可到茶馆歇歇，跟南来北往的人聊聊天，吹吹牛。家长里短、各地新闻，甚至古人头脑中的“世界”大势，都在茶馆中聚集、扩散。“泡茶馆”“坐茶馆”这些词语，十分形象地刻画了百姓与茶馆的关系。此类茶馆在今日中国已较少见，但广式茶楼却又兴起，与亲朋好友一起，叫上一壶茶，点上几个点心，就着茶吃下去，可消磨半天时光，与泡茶馆颇有相似之处。

茶之传播

中国茶和茶文化向外传播的历史同样悠久。茶叶一方面与中华文化、佛教相结合，经由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广播海内外，如唐宋时代日本派遣到中国的大量遣唐使，在学习中国文化的同时，将饮茶的习惯也带回了日本。之后，日本的饮茶习俗与禅宗相结合，形成日本茶道；另一方面，伴随着茶叶贸易，中国的茶与茶文化也向欧洲、美洲进行传播。十七世纪中国的饮茶习俗传入英国，并成为宫廷中的“时髦”饮品，英国皇室经常在宫廷中举办茶会，引起社会各阶层效仿。十八世纪时，茶已成为英国人的普遍饮品，之后的英国政府为了能得到更多的茶，想尽办法从中国移植茶树与茶种，学习制茶技术，甚至为了茶叶发动了贸易战争。

今日，饮茶已成风靡世界的一种生活方式，日本的茶道、英国的下午茶，也都成了他们自己民族的特征。在中国，茶经历数千年的流变，已然成为人们“柴米油盐”生活的一部分，品茶成了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深入骨髓，是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基因和文明符号。不同的人的茶中品出了不同的味道，人生百味，尽付一碗茶中。（作者为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须立志勿胡涂。专门望习农工矿，先哲辛劳记得无。”他不再单纯地要求儿子们习举业，走仕途，认为精于农工、商贾也能够自立。在他的安排下，郑润林留学日本毕业于法政高等警察学校，次子郑润潮入读北京的税务学校，三子郑润棠就读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四子郑景康（原名郑润鑫）中学毕业后被送到上海一所商业专科学校就读。郑观劝诫他们在校要熟练掌握一门知识技能，并作比喻说：“小如蜘蛛尚能结网，蜂能酿蜜，蚁能聚粮，人为万物之灵反不如物，能无愧乎？”

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精细，进入之人“是技皆可成名天下，惟无技之人最苦，片技即是自立天下”的时代。郑观应的这一家训具有前瞻性，体现了他顺应时代潮流的较为开明的教育意识，对当代社会家庭教育选材的观念也得以改变。他作诗寄长子郑润林说：“欲作人间大丈夫，必

◎ 文明密码

2016年的中国十大考古发现正在火热的评选中。在最终入围的25个项目中，辽宁朝阳市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的考古非常引人注目。它是继牛河梁遗址之后，红山文化近些年最重大的发现，为解决红山文化研究中的一些重大课题提供了最丰富的资料。

这处距今约5305年—5045年的红山文化晚期的积石冢墓地，考古发掘面积约1600平方米，考古工作者清理出墓葬78座、祭坛1座及祭祀坑29座。考古工作者首次在红山文化积石冢上发现柱洞和础石，推测该建筑遗址具有祭祀功能。一座家内发现墓葬78座，这是单体家内发现墓葬最多的，极大丰富了红山文化的人骨材料；家内墓葬中共发现玉器140余件，也是单体家内发现红山玉器最多的；多件玉料、玉器加工的半成品和玉钻芯的发现，对研究红山玉器的玉料、加工技术、加工工艺具有重要价值。

牛河梁遗址通过正式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具有典型地域特征和时代风格的玉器，多为墓主人生前使用，死后用来随葬，成为墓主人生前社会等级、地位和身份的象征和标志物，形成了具有唯一性的玉礼制系统。这批造型独特、内涵丰富，具有明确专属功能的玉器，成为中国史前玉器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期的代表。

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便是发现数量多、分布地域广的C型玉龙及玉猪龙。龙的信仰或者说崇拜曾经在中国的多个区域存在，而且大约在六千年前，开始了互相影响的过程。红山文化中的玉猪龙，精雕细琢，双耳竖起，双目圆睁，吻部前伸，身体蜷曲如环，源流清晰，可追溯溯源到兴隆洼文化精美绝伦的玉块。红山文化的C型玉龙与甲骨文中的龙字最相似，可以说是中国龙的祖形。专家认为，辽西地区是

## 红山文化：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

杨雪梅



红山文化玉龙，1971年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塔拉出土

黍、粟等旱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而干旱是困扰农业生产的主要因素，祈雨、祈求农业丰收也是祭祀的重要内容，龙文化在这里起源有它合理的解释，之后以龙为形象的玉器更成为礼器或者通神的媒介，逐渐演化成为生丁斯长的先民的共同信仰。

考古学家苏秉琦曾说：“红山文化坛庙三种遗迹的发现，代表了我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它的社会发展阶段已向前进进了一大步，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也正是以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的突破性考古发现为基础，才开启了探索与思考。

墓葬中等级最高的石棺墓，棺内除主人遗骸外，更有惊人的陪葬品，玉猪龙、玉璧、石钺及兽首形钺柄端饰叠压共出，这是首次在红山文化墓葬中发现一整套完整的带柄端饰的石钺，钺是军事权力的象征，说明红山文化也有战争，并不仅仅是依靠宗教或者信仰来控制各个利益集团。还有数量众多的石雕人像，形体大，造型奇特，面部和发饰具有写实特征，出土位置明确，是研究红山文化宗教祭祀观念和成就的新材料。

红山文化因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后遗址的发掘而得名，是中国东北地区最著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之一，在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社会发展进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对东北亚地区同期或稍晚阶段的史前文化曾经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930年，考古学家梁思永到赤峰英金河流域进行史前考古调查，揭开了辽西地区田野考古的序幕。1935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滨田耕作、水野清一等人对赤峰红山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获得一批丰富的陶器、石器实物资料，提出了“赤峰第一期文化”和“赤峰第二期文化”的命名，出版了《赤峰红山后》的考古报告。1954年，著名学者尹达首次正式提出“红山文化”的命名，强调红山文化对于研究长城以北和以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相互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1983年，辽宁朝阳牛河梁遗址群开始正式考古发掘，成为红山文化发现与研究历程中的重要转折点。牛河梁遗址群分布范围广达50平方千米，发现有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大型祭祀平台等遗迹，是迄今所知规模最大的、最先进的、级别相当高的红山文化晚期墓葬和祭祀中心。积石冢内有中心大墓、次中心大墓、边缘墓之分，显示等级制度已经确立。



欢迎关注《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部微信公众号“文艺菜园”